

大力推动产业与金融合作

□ 王新哲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分析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重要著作，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深刻理解《资本论》的现实意义，准确把握实体经济和网络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产融合作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不仅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优化带来的压力，在获得有效金融支持方面也存在一些阻碍和困难。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6年我国GDP突破70万亿元，连续5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达226.26万亿元。但是，金融创新带动经济虚拟化进程加快，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收益率明显高于实体经济，并出现了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现象。

融资问题制约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当前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轻资产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卡脖子问题。在完全依赖市场的情况下，金融体系不愿把资本配置在这一新生的高风险产业中，金融解决经济发展瓶颈的“雪中送炭”作用尚未有效发挥，在一定层面上制约了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金融进入产业的通道有限。目前，企业融资渠道有限，银行间接融资仍是企业资金来源，直

接融资比重过低。从国际上看，G20国家直接融资比重大多集中在65%-75%之间，而我国直接融资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我国企业将IPO和增发新股作为直接融资主渠道，债权融资作用尚不明显。在缺乏必要引导的情况下，金融资本难以进入产业，进而造成金融过度发展，加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

推动产业金融协调发展的具体实践

近年来，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产业与金融合作为抓手，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开展了大量工作，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

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推动产业与金融对接。按照国务院的要求，2016年3月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印发行动方案，以强化产融信息共享为切入点，推动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银企对接活动，引导金融机构精准支持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的融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自2016年3月份以来，各地组织对接活动3000多场（次），参与企业8万多家，涉及融资需求6万多亿元，实际发放贷款超过2万亿元。

创新金融服务，拓宽产融合作渠道。适应制造业发展需要，多措并举拓宽产融合作融资渠道。如四川省针对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特点，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20余款新产品。同时，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工信部组织动员企业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2016年制造企业在上交所发行公司债近2900亿元。工信部还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合作，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出口

信用保险支持。2009—2016年间，中国信保共支持企业保单融资约1.3万亿元。

开展城市试点，探索产融合作有效模式。2016年7月，工信部会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印发通知，组织开展试点城市申报工作，鼓励地方积极探索产融合作的有效途径。2016年底，北京市海淀区等37个城市确定为“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重庆、深圳等产业金融发展水平全国领先，经济规模达到万亿元以上，义乌、桐乡等产业特色鲜明。据统计，这批试点城市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1/4，金融资源占1/5。

全面发力推进产融合作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目的。这些论断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深刻把握，也为当前产融合作工作指明了方向。推进产融合作应重点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加强产业与金融信息共享，深化政银企互动合作。及时掌握和反映企业融资需求，汇总和整理重点企业 and 重点项目融资需求信息，为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提供参考依据。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进产融信息对接服务平台建设。同时，鼓励各地组织开展银企对接会、融资洽谈会等线上线下对接活动，提高对接成效。

借鉴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经验，推广产融合作模式。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工作是创新金融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的落地之举，要做好产融合作成功经验和典型模式的宣传推广，

挖掘第一批试点的典型案例，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研究建立相应评估指标体系，制定试点工作相关考核与奖励办法，组织专家进行考核评估。同时，要研究制定相关财政扶持政策，对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的城市给予资金支持。

大力推广产业链金融，降低产业融资成本。深入总结大型制造业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制造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参与产业链金融的经验做法，推动具备条件的制造业产业链核心企业开展产业链金融相关业务，降低产业链整体融资成本，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鼓励制造业企业通过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方式，实施设备更新改造和智能升级。

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引导企业加快改革发展。发挥证券、债券、保险、基金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扩大企业直接融资规模。围绕重点企业的融资需求，通过推荐、培训、辅导等多种方式，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结合企业改制上市、并购重组、发行公司债等资本运作需求，协同做好企业培育工作，引导企业完善现代管理制度，提升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

推动政策协同，形成引导资金流向制造业的合力。完善产业部门与财政、金融部门的协同配合机制，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协同发展。鼓励各地聚合产业、金融、创新、政策等各类资源，探索“三链”协同发展的路径。同时，各地可以根据自身实际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促进中央和地方基金协调互动。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青一班学员、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等战略举措，为农村发展描绘了一幅清晰蓝图，为农民规划了更加美好的前景。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要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服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建设新时代新农村贡献力量。

当前，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生产要素和产业加速向城市聚集，我国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36%左右，至2016年末已攀升至57.4%。相对于城市的高速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户籍、住房、教育、医疗、保障等制度建设有待完善，每年有上亿农村人口离开家乡来到城市，不少乡村发展活力在降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指明了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5年“三农”工作历史进程中极不平凡5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三农”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就是始终坚持“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例如，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是以历史眼光和战略智慧对“三农”工作的时代定位，也蕴含着深厚的“三农”情怀和远见卓识，推动“三农”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

5年来，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产量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农民持续增收，人均年收入迈上1.2万元台阶；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000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靠天吃饭成为历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农产品精深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快速增长；涉及“三农”改革的文件密集出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农业现代化规划、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一系列文件，为“三农”工作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农业政策性金融如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进一步做好农业政策性金融工作指明了方向。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围绕支持粮棉油收储，全力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支持粮棉油收储是农业发展银行的首要职责，是立行之本、发展之基，更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主动顺应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正确处理保收购与防风险的关系，培育壮大优质战略客户群，加大对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巩固和提升在粮棉油收储信贷领域的主导地位，全力保障粮棉油收购不出现大的问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延伸信贷支持链条，积极支持粮食种植、购销、加工、销售、流通等全产业链发展，使全产业链各个环节前后呼应、各信贷品种之间互为补充，为粮棉油全产业链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全产业链金融服务。

围绕支持现代农业，助力打造生活富裕乡村。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发力点，也是农业发展银行下一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领域。积极支持构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即

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的现实适用性问题

□ 尹汉宁

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支，是专门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我们说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也包括受其中发展经济学的影响。我们说用理性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也包括理性地对待发展经济学。比如对待发展经济学中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理论，也应该具有理性态度，不能不考虑时空条件，简单地照搬照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工业化的环

境条件，也不同于二战后拉美及亚洲小国和地区的发展环境和条件，现在的实际发展进程和发展环境与发展经济学创立之初的环境和条件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现在80%以上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生产环节和供应链的分工。因此，简单地按钱纳里的标准来判断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并相应地要求重点发展什么产业，不发展什么产业，似乎不合时宜了。在技术革命和新技术产

业发展的今天，工业化与信息化正在融合发展，已经有工业1.0、2.0、3.0、4.0的说法。

特别在中国国内的某个区域，简单地套用钱纳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就显得更加不合适了。一些地方在分析经济发展进程和制定发展规划时，通常会以是否具有某些产业或者没有某些产业为标准判断工业化处在什么阶段，如处在工业化的中期、中后期等等，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发展规划，强调重点发展什么产业，不发展什么产业，比如工业

化初期轻纺工业发展不充分，现在需要补充发展，等等。

这样做之所以没有必要，是因为一个地区的产业布局是全国产业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未必要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而要服从国家总体布局，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产业特色。有的同志说，中国一个省的人口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但无论人口多少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区域，不能也不需要按照一个国家独立的产业体系来布局产业。

由此看来，对发展经济理论，包括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理论，我们可以研究参考，但不能以此为依据判断工业化发展阶段，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学习千字文

国有企业党委书记如何当好新时代

□ 张国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总布局、总目标和重点任务，这是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委书记的角色由党委书记交叉兼职副总经理，转变为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一肩挑”；主要任务由抓党建保中心工作，转变为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承担“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主体责任。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是涉及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都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由国有企业代表党和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是经济转型期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安定和谐、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是国有企业要控制涉及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是坚

决贯彻党中央决策意志的中坚力量，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二是国有企业要成为转变经济模式、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国内国际、推进科技创新的主力军。笔者认为，国有企业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是实施“一带一路”“走出去”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三是从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的角度来讲，国有企业大规模的存在，依靠和壮大广大工人阶级的力量，就是缩小两极分化、维护社会稳定的“缓冲器”。四是国有企业的性质也决定了国有企业是我们党赢得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因此，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为了使国有企业更好地成为“六个力量”，为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二

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在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的基础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一是深刻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两个“一以贯之”，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加强国企党建工作的重要论断和明确要求，为国有企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指明了方向。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可以说是牢固树立制度自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具体体现。二是深刻认识党委的治理主体地位和尊重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依法履行职权的辩证统一。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强调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

心和政治核心作用。通过党委的工作，让每一个治理主体都更好地发挥作用，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三是深刻认识尊重和发挥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作用与监督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辩证统一。

三

每个企业、每个行业各有各的特点，同一个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也不相同。因此，要以矛盾论、实践论的思维方法，找准所处行业、所在企业的主要矛盾，找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抓手，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真正发挥“六个力量”的重要作用。一是党委书记必须清醒认识国企党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讲政治、把方向、管大局上发挥作用，切实保落实、促管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贴近企业实际，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寻找着力点和突破口。把握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本质属性就是盈利，否则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就无从谈

起。熟悉和善用企业的盈利模式，成为善经营、精管理的行家里手，坚持服务和促进生产经营。二是必须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全面、系统地理清企业的发展阶段、商业模式、股权结构、核心团队等，找准主次矛盾，以党建为抓手、以主要矛盾为重点对象，统筹解决各个层次的问题，促进企业的改革发展。三是树立法治思维，尤其要善学善用公司法，熟知各治理主体的法定权限，掌握各治理主体的协调运行机制，进而熟练掌握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制度运行的内在规律。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就在于，党嵌入于法人治理结构之中，发挥独特优势。所以，一定要理清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各治理主体的内在治理逻辑，通过党委工作，调动各个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使我们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运转得更好。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管金融企业、中管企业中青年领导人员培训学员，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